

■ 时事深论

从黄金周“大考”看政府综合管理

□ 王晨光

被称为“史上最长最火爆”的中秋国庆黄金周已经成为过去，但社会各界和媒体依然沉浸在对其是非曲直的回顾和反思当中。

从旅游部门“独角戏”到强势部门纷纷介入

屈指数来，我国实行黄金周制度已经进入第十四个年头。如果说前十三年政府对黄金周的管理主要是靠旅游部门在唱“独角戏”，那么本次黄金周突出亮点可以说是有更多政府强势部门的介入。具体说，从2012年7月24日国务院发布《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开始，在中央政府层面，就有交通部、发改委、公安部等部门纷纷出台专项推进政策。其中交通部的支持可谓是不遗余力，不仅自始至终督促各地落实高速公路免费政策，还通过动态调整发卡管理等措施，保障了高速免费这一“大礼”得以顺利落地。这充分体现出政府对黄金周的支持力度较前更有提升，也标志着政府在重大旅游节庆的政策调控和社会管理方面正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全新模式。

根据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发布的《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日旅游统计报告》，在今年中秋国庆8天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4.25亿人次，比2011年“十一”黄金周增长40.9%(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3.3%)。不仅如此，节前曾有专业机构预测，今年黄金周期间将有约7.4亿人通过公路、铁路、民航等方式出行，创下同期出行新纪录，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540万人。我们查找到10月9日铁道部发布的消息，9月27日至10月7日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8033万人，已经超出了此前机构预测的水平。

上述数据意味着，在本次黄金周期间，有接近全国三分之一人口规模的国民充当了旅游者的角色，超过全国二分之一人口规模的国民

◆在当前带薪休假制度实施条件尚不具备的大背景下，对现行黄金周制度及时加以优化仍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其中首要的任务是要转变管理理念。政府政策的着眼点不应只局限于高速公路和旅游景点免费等经济性措施，而要把管理目标聚焦在如何使国民通过旅游、休闲、度假等活动全面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如何推动尽快构建相应的旅游市场规则和旅游休闲产业体系上来。

“黄金周”只是过渡性措施 应建立国家休闲度假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我国真正意义的带薪休假制度是从1999年政府启动“黄金周”政策正式开始的。

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黄金周”与“带薪休假制度”以及“提升国民休闲福利”等同起来。要知道，1999年创设黄金周制度的初衷主要还是为了刺激消费，应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是着眼于其中的经济价值。而带薪休假制度的本义则在于提升国民的社会福利、转变过去的生活方式。显然，早期的“黄金周”只是实现带薪休假目的的一种特殊形式，绝不能把这种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的黄金周当成衡量带薪休假制度的标杆或依据。

过往十三年的经验证明，以“黄金周”方式为代表的集中式或应急式休假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国民对休闲度假生活方式的客观要求，相反，其人为制造供求失衡、损害游客生活品质的弊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因此，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回归国家节假日制度的本位，重新提出以提升国民福利和促进社会

发展为基本内涵的节假日价值观。而“黄金周”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过渡性措施，也应该逐步将其功能目标由经济增长单轮驱动转换到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并重的双轮驱动模式上来。从长远看，政府则要立足于推进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目标，构建以带薪休假制度为基础的全新的国家休闲度假发展模式。

以“人民更满意”为目标 进一步提升协同管理水平

应该看到，在当前带薪休假制度实施条件尚不具备的大背景下，对现行黄金周制度及时加以优化仍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其中首要的任务是要转变管理理念。既然当下黄金周休假已经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大众福利，那么政府政策的着眼点就不应只局限于高速公路和旅游景点免费等经济性措施，而要把管理目标聚焦在如何使国民通过旅游、休闲、度假等活动全面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如何推动尽快构建相应的旅游市场规则和旅游休闲产业体系上来。只有确立好正确的发展目标，才能推动已经运行了十四年的黄金周制度走出“死结”，实现其市场和产业的良性循环。

政府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是面对黄金周这样的“大考”，更能考验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智慧。尽管前面我们曾经称赞过本轮黄金周政府管理方式由单一部门管理向多部门协同管理和综合管理转变所取得的进步，但

■ 理论动态

应对欧美“再工业化” 制造业应从低端走向高端

《金融时报》10月9日文章：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外部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追赶，而且也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对制造业的重新定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弊端。在后危机时期，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正成为趋势。

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带来冲击。从国内因素来看，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成本的上升是一大趋势，近年来我国频频出现的“用工荒”验证了这一趋势。不仅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环境日益紧张，资源型产品价格长期看涨。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依靠闲置土地、劳动力密集、低廉甚至免费的自然资源从而占据全球低端产品市场的时代正在过去。

挑战也是机遇。从日本、韩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发展路径来看，我国制造业从低端走向高端是大势所趋，我国制造业应顺应正在进行的“再工业化”潮流，主动出击进行变革。

在当前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发展遭遇瓶颈的敏感时期，如何跨过这道坎，实现从“低”到“高”的华丽转身，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是关键。

盈利能力显著下降 大企业需要“软性”成长

《人民日报》10月8日文章：《2012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披露的数字表明：中国企业500强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盈利能力却显著下降。

比如，同样处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中，2012年美国企业500强盈利状况快速恢复，中国企业500强的盈利能力指标在连续3年领先美国企业500强后，今年被美国企业500强反超，净资产收益率为12.1%，低于美国企业500强2.1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为4.7%，低于美国企业500强2.3个百分点。再比如，2012年入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更多的表现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国大企业在核心技术研发、品牌创新、消费者的深度研究、产业链主导能力的培育、全球资源整合等软性指标方面还有巨大差距。

盈利能力显著下降，显示出中国大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还不强。究其原因，还是中国企业的那个老问题：大而不强。当前，在内需不振，许多领域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依赖资源投入的粗放发展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我国大企业只有通过创新驱动的“软性”成长，才能在规模继续成长的同时实现做强和做优。

重视互联网作用不能 “网上用功，网下稀松”

《学习时报》10月8日文章：一谈到重视互联网的作用，有的领导干部曾片面地认为：只要建个政府网站，挂个政务微博，设个舆情监察室，选几个好的新闻发言人就OK了。这种认识导致他们过多地把精力耗在了网络上，一旦将舆情对付过去，就没有了下文，也不再寻求彻底解决之法。真可谓“网上用功，网下稀松”。

正确地认识了网民的声音，才能实事求是地发好言。党政机关新闻发言人应该给自己更高的要求，练好更加扎实的内功，具备更高的素质。面对网民提出的问题，绝不能躲躲闪闪、遮遮掩掩，要实事求是，正面表态。

更重要的是，办好事情是最好的“发言”。“打铁先得自身硬”，有关部门对老百姓在网络上反映的问题要耐心倾听，悉心研判，精准回应，切实落实，让老百姓见到实效，得到实惠，并且能建立长效机制作为保障，真正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日常工作中，要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密切联系群众，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让决策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同时要切实加强党性修养，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廉洁奉公，严格自律，在网上和网下都能树立良好的形象，成为老百姓真正认可的表率。

对长期闲置空房征税 可达到“一石三鸟”目的

《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39期文章：房地产泡沫直接威胁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小，原因就是房地产泡沫有可能破裂。根据别国经验，空房率太高是泡沫破裂的前提。国际上对长期闲置空房征税的正反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对长期闲置的空房征税有几点好处。首先，大部分空房闲置用于出租，泡沫得以削减，经济硬着陆的危险可以减少。除了对空房征税，很难有办法能使空房住上人。房屋一直空下去，泡沫的危险就一直存在。第二，房产长期闲置是国民经济的巨大浪费。将闲置住房变成服务于百姓的住房，可避免浪费。而且房产主得到收入，这部分收入实际上是新增的GDP，能够缓解GDP下降造成的损失。房产主增加了收入，也就是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有利于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来自电力部门的消息说，全国有6400多万套住房六个月内电表不走字。如果按月计算1500元计算，一年出租空房可以增加GDP1.1万亿元，合现有GDP的2.5%。这绝不是小数。第三，如果房产主不愿出租而愿意交税，这部分税收是从高收入群体征得的，对缓解贫富差距有利。如果他们愿意将空房出租，大批空房投入市场，会使房屋的租金下降，对租房者是福利。租房的人多半是低收入者，因此又帮助了社会上的低收入群体。所以说是一石三鸟。

信息技术筑盾 反腐倡廉建设

□ 刘贵丰

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技术化，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基本具备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手段来控制和监督行政权力运行的技术条件，如果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到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压缩腐败现象发展的空间，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概率。在这方面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现代社会的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逐步增加科技含量，把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到反腐倡廉建设的各项工程当中，牢牢筑起反腐倡廉的科技盾牌。只有这样，我们的反腐倡廉建设才能适应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2009年山东省提出建设一个纵向贯通省市县、横向涵盖各领域的预防腐败网络，打造电子政务服务、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资金监管、舆论监督、党风廉政教育六大电子信息平台，构筑“一拖六”综合电子监察系统。随着科技反腐工作的深入，山东省纪委又把这六大电子信息平台细化为十八个电子监察系统，这就是：政府信息公开电子监察系统、政府投资项目公开电子监察系统、行政审批及电子监察系统、行政征收及电子监察系统、行政处罚及电子监察系统、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及电子监察系统、土地出让及电子监察系统、政府采购及电子监察系统、产权交易及电子监察系统、社保资金电子监察系统、住房公积金电子监察系统、扶贫资金电子监察系统、救灾救济资金电子监察系统、财政专项资金电子监察系统、信访举报系统、行政效能投诉系统、行风投诉系统、党风廉政教育系统。

这些电子监察系统在反腐倡廉方面发挥的功能主要包括：

可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程序。通过开发行政机关内部业务管理和监督系统，可以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促进相互监督制约，把预防腐败的要求贯穿于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之中。比如说对保留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政执法事项进行流程优化，编制软件程序，实行网上办理，用无情的“电脑”制约有情的“人脑”，做到固定流程、责任到人、明确时限、全程留痕。如果在上一道程序中违规办理，就进入不到下一道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操作的空间。

便于社会各界对行政权力的运行状况进行监督。通过加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在服务窗口安装音频、视频电子监控系统，设立群众满意度测评器，对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承办、批准和办结等环节进行全程监控，及时发挥预警纠错功能。在网上设置相应监察点，对出现的违规情况，由系统自动给相关人员发出预警信号。通过建设公共资金监管电子监察系统，把专项资金全部纳入网络平台运行，实现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验收、审计等环节的动态性、全过程、全方位监控，让社会各界能够随时查询、参与监管。

方便人民群众对消极腐败现象的举报和舆论监督。通过建设信访举报系统、行政效能投诉系统、行风投诉系统，能及时收集人民群众对消极腐败现象的举报信息和投诉信息，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对群众的举报和投诉信息进行反馈。

方便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通过建设党风廉政教育系统，建立专门的廉政网站或在主流网站上设立网页，及时发布反腐倡廉动态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网络宣传工作，形成正确的网上舆论导向。在网上推出廉政公益广告、廉政书画作品专栏，开设“廉政文化教育馆”、“警示教育之窗”等，展示各类廉政文化实物、图片及警示教育片，营造浓厚的网络廉政教育氛围。（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

■ 道听图说



“红色罚款单”

结婚这等人生大事，自然少不了请亲戚朋友捧场。这种捧场，断不能“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人情世故，红包往来，朋友结婚，人场或缺，钱场少不了。可是，当你辛辛苦苦大半年，好不容易才攒下几个小钱，又好不容易才迎来一个长假，却半路杀出一堆“红色罚款单”，眼着腰包和长假一起泡汤，这真是情何以堪啊！

“冤冤相报何时了，酒店餐饮在偷笑”——网友戏言可谓一语中的。只要婚俗观念还是那老一套，“冤冤相报”就难有了时：这次你收了“罚单”，下次或许会变成了开“罚单”的，谁知道呢？

图/春鸣 文/小正

语言的流变

□ 任宇波

他堆砌文字，因为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都希望他能从中找到漏洞，当作攻击口实。这种以文字为工具的对抗游戏，是一种在朝与在野的政治冲突体现。

然而具有权威性的语言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劫难后的中国传统语言已经变换了模样。西风东渐，再加上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逐渐代替了文言文，过去官方与民间共同的语言体系被打破，慢慢呈现出一种割裂状态。时长日久的混乱状态下，就如张维迎所言的，一些人出于不同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由此带来了语言腐败。以官方话语为例，“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除”、“砍伤与戳伤之辩”，个中语言的有意修饰已经让舆论模糊了视线、辨不清真相。这不是智慧，而是篡改词义与有意隐瞒。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这些语言往往由基层、低层的官员创造出来，却又无意识地配合和表达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方法。

在语言的原始意义被颠覆之后，官方行文表达也逐漸有僵化之虞。在一些新闻发布会、研讨会中，讲一些言不由衷之言，听一些不甚顺耳之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有一些渐渐成了程式性的模板，只要换一下主语，改字增词，就可以顺风顺下，方便无比。讲的人舒服，听的人轻松，讲过听过，一哄而散，彼此都不当一回事。因皆知晓其中的泡沫所在，故而心照不宣。近日，一段女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发言人”满口“密切关注”“无权干预”等外交辞令，将外交程式性语

言模仿得惟妙惟肖，让人啼笑皆非，这种较为稳妥固定的程式性语言的“深入人心”也由此可略见一斑。

意在言先。但如果语言的精准度打折扣、形式又僵化，心中之意必然难以准确精彩地表达出来。在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人与人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的当下，语言的模糊性，使得在一个共同意义和范围内展开理性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而更让人担忧的，还在于这些始作俑者在创造和使用某些话语过程中的一种无意识性，这种无意识性会形成畸形的语言在日积月累之中，慢慢形成一个体系。这恐怕也是时下国人中文水平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好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即使有些官方表达方式偏重掌控分寸，故而显得安全保守索然无味，民间智慧却并未枯竭，且逐渐发展出一套迥然不同，却又暗含多重社会意味的鲜活话语体系。拿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来说，“北漂、草根、达人、愤青、蚁族、宅女、月光族、粉丝”等众多“潮味十足”、“富有生活气息”的新词被收录。这些新词、新义像一面广角镜，全方位地折射着社会的深刻变化，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且大部分都是民间的自创词，与百姓的生活紧密贴近。可见，让权威的活语言体系向民间智慧“开放”是一种趋势，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语言的大众化革新。这是否也预示着，社会发展总的趋势将是越来越走向活语言和文化的多元化与平民化，而不是走向单元化、模式化和精英化呢？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思想随笔

在这样一个人人手握麦克风的年代，让人一天不吃饭有可能，但让人一天不说话，也许就没那么容易。语言是如影随形的，往往与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互为表里。

古语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话无文采与条理，就不会流传久远。在“文章乃经国之大事，不朽之业”的传统中国社会里，历来是官方重辞令、民间重口才。而要想使官方意图或者民意诉求达到目的，就必须使用一套套所用的活语言体系，秦始皇统一文字、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意义即在于此。自此后，无论是官方的奏折、批语，还是民间的学术研究，无论是身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旧时的活语言体系都秉承了一个共同的来源——儒释道经典。达官贵人、文人士子要表达就必须具备合法性来源，就得腹中有货，如清人袁枚所言：此地有丛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官场中人要打官腔，故作高雅，引经据典，那必须慎之又慎，要靠一帮“绍兴师爷”帮